

# 洲仔尾花園、大橋港— 從古地圖及方志所作的考證\*

曾曬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退休教授

## 摘要

「洲仔尾花園」為延平王世子鄭經（1642－1681）1680年於武定里興建的行宮，其存在的時間極為短暫，〈艾渾、羅刹、臺灣、內蒙古之圖〉中的〈臺灣與澎湖列島圖〉（1686－1689）為極少數記錄此花園的地圖。本文以此圖為例，探討以「大橋港」及其支流環繞「洲仔尾花園」的獨特意象呈現，與周邊實際地理環境之落差，詮釋此一「心象地圖」（mental map）的象徵意涵，分析其製圖概念與明鄭時期輿圖傳統之關連，並予以定年。

十八、十九世紀不同版本的方志對於「大橋港」的記載存在一些差異與相互矛盾，造成理解上的困擾。本文藉歷史地理的比較與分析，相關的地圖與文字記載以及此水系形態的檢視，釐清「大橋港」、「小橋港」的主、支流關係，分辨不同時代對「大橋港」指涉範圍的差異，確認「大橋港」乃柴頭港溪幹流中的一段，而非其「分流」。

關鍵詞：洲仔尾花園、大橋港、心象地圖、製圖概念

---

投稿日期 110 年 6 月 29 日、送審日期 110 年 7 月 2 日、通過刊登 110 年 8 月 6 日。

「洲仔尾花園」為延平王世子鄭經 1680（永曆 34、康熙 19）年於武定里興建的行宮，又稱「承天府行臺」，入清之後於 1690/91 年改建為「海會寺」（開元寺）。「洲仔尾花園」因其建築「峻宇雕牆、茂林嘉卉，極島中之華麗」，<sup>1</sup> 在明鄭時期與清初的人文地理上，勢必佔有一席之地。但清領之初的臺灣輿圖上，甚少出現此園的蹤跡，目前所知，僅有橫幅長卷〈艾渾、羅刹、臺灣、內蒙古之圖〉中之〈臺灣與澎湖列島圖〉（1686–1689），在一塊被兩條溪流的水道四面環繞的沙洲上，註記著「洲仔尾花園」。除此而外，康熙《福建通志》補刻本上的〈臺灣府三縣圖〉（1686），在相同的地理位置上，呈現類似的河川形態與江心洲，但卻省略了「洲仔尾花園」的註記，或可謂之為隱性的例子。「洲仔尾花園」存在的時間極短，前後僅 10 年，加以明鄭末年與清領之初傳世的臺灣輿圖寥寥可數，因此出現在輿圖上的機率極少。相對地，改建為梵刹後的「海會寺」，則經常出現在清代臺灣輿圖上，例如年代相去不遠的〈臺灣地里圖〉（c.1691–1704）或〈康熙臺灣輿圖〉（1699–1704）。然而此二圖所呈現「海會寺」周邊的地理環境與河川形態，與「洲仔尾花園」卻有天壤之別：「海會寺」座落於溪流的右邊，並未被水道所環繞，其附近也無任何曲流的跡象。究竟是河川形態在短時間內產生巨變，抑或輿圖繪製概念的差異，導致前後的地理景觀截然不同，何者較為接近實際的狀況，以及如何解讀〈臺灣與澎湖列島圖〉上「洲仔尾花園」的特殊地理環境呈現等等，這些議題皆有待進一步探討，而首要釐清者為流經「洲仔尾花園」（海會寺）的水系及其河川形態。

\* 本文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退休教授張瑞津提供寶貴意見與參考資料，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候選人游牧笛提供套疊圖與參考資料，獲益良多，謹致謝意。

1 林謙光，《臺灣紀略》（附澎湖），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澎湖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4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 年 5 月），頁 53–65，頁 54。

關於「洲仔尾花園」（海會寺）的地理位置，方志上的記載概為位於府治北方五、六里處，附近的地標則有「永康里北路往來路頭」的「大橋」（大橋頭）。<sup>2</sup> 流經「大橋」的溪流原為「大橋港」，其支流為「小橋港」。由於十八世紀始縣志上改以不同的名稱：石頭坑、石頭溝、柴頭港溪等稱此溪流，而府志各版本之將新舊河川名稱一併載入，不僅造成重複，又因遺漏關鍵性的文字，導致與縣志的記載相互矛盾，徒增研判此溪流形態的困擾。因此，本文重新檢視歷代臺灣方志對此溪流的文字描述，確認相關的地點與河道，盼能找出問題的癥結，梳理其矛盾。「大橋」、「小橋」的名稱來自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道路、橋樑建設。那時荷蘭人所測繪的地圖，提供相對可信的地理資訊，甚或「大橋港」與「小橋港」最早的圖像紀錄，是不容忽視的文獻史料。此外，臺灣府志、縣志中之附圖，以及日治時期所測繪的《臺灣堡圖》（1904）、《臺灣地形圖》（1921—1928）等，皆是用以釐清「大橋港」與柴頭港溪關係的重要依據。透過地圖與方志記載的對照分析，盼能解碼「大橋港」所指涉地點與範圍的時代差異。此外，藉〈臺灣與澎湖列島圖〉的分析，將進一步探討「洲仔尾花園」地圖圖像之意涵以及明鄭時期臺灣輿圖的製圖概念（cartographic concepts）與特色。

## 壹、「洲仔尾花園」的呈現與〈臺灣與澎湖列島圖〉的製圖概念

〈艾渾、羅刹、臺灣、內蒙古之圖〉（彩繪絹本，單幅 55 x 104 公分，

2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1742）卷 5：〈城池・橋梁〉，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 3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 3 月），頁 290。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1752），卷 6：〈祠宇志・寺宇〉，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 9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 3 月），頁 538。

整組 55 x 585 公分)為四幅與中國邊疆相關的景觀圖及地圖所組成的長卷，以山水畫法繪製，現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艾渾之地〉、〈羅刹之地〉描繪的是清軍於黑龍江軍事重鎮駐紮巡防，以及與俄羅斯(羅刹)激戰的情形，主題涉及 1685、1686(康熙 24、25) 年的俄清邊境衝突，以及隨後 1689(康熙 28) 年的尼布楚條約、劃定疆界、外滿州(外東北)歸中國所有等歷史事件。這兩幅描繪真實地點，表現地理事實的景觀圖，兼具圖畫與地圖的要素，而非純粹想像的山水畫，實際上應屬《三才圖會》中所謂的「地理圖」(geographic illustrations/maps) 範疇。<sup>3</sup>〈內蒙古之圖〉描繪由寧夏至遼河、長城與 1681(康熙 20) 年新築的柳條邊以北，內蒙古諸旗及部落游牧地區的分布情形。〈臺灣與澎湖列島圖〉(圖 1) 則描繪 1683(康熙 22) 年甫入清版圖的臺灣與澎湖群島之山川、港口、行政建置與軍事防衛的狀況。這四幅圖的組合顯然具有宣揚康熙的武功、紀念戰役，以及頌讚帝國疆界遼闊之意，其畫工相當精緻，可能出自清宮舊藏。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部門將這一組地圖定年為 1697 年至 1722 年之間，此與上述這些事件發生的年代相距有些久遠。其中〈臺灣與澎湖列島圖〉的繪製年代，根據其製圖概念與註記，尤其是河川的形式特徵與現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的康熙《福建通志》六十四卷(補刻本) 上的〈臺灣府三縣圖〉(1686)(圖 2) 十分相似來判斷，應更早且與後者較為接近，就此下文將作進一步的分析。

3 Cordell D. K. Yee: "Chinese Cartography among the Arts: Objectivity, Subjectivity, Representation," in: John Brian Harley, David Woodward (eds.): *The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128–169, pp. 152–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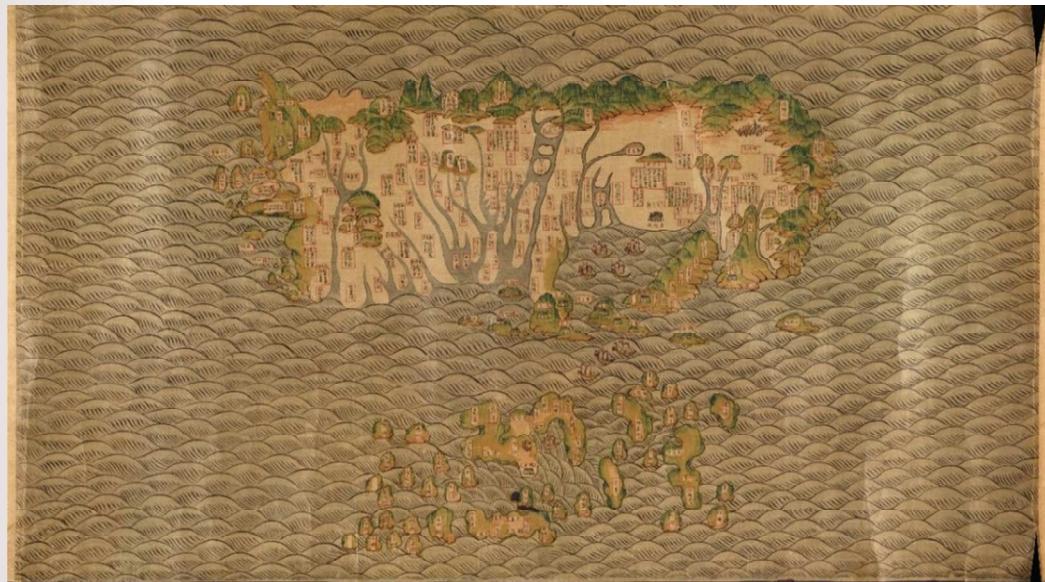


圖 1：臺灣與澎湖列島圖，1686–1689 年，彩繪絹本，55 x 104 公分，華盛頓 D.C.：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圖版來源：中央研究院數位方輿 Reading Digital Atlas 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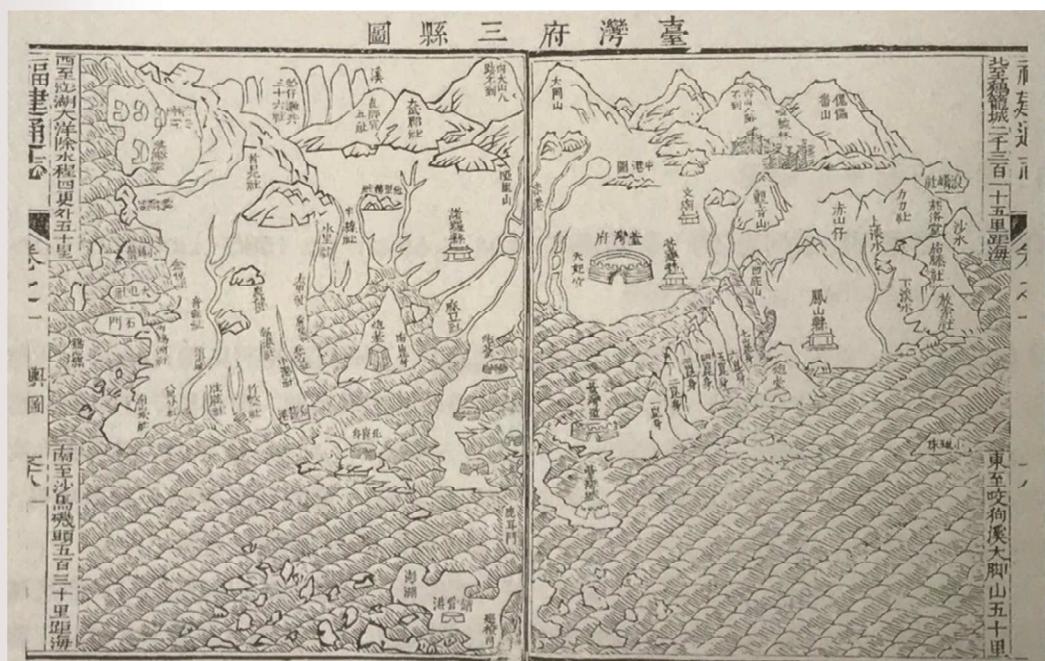


圖 2：臺灣府三縣圖，1686 年，木刻墨印，康熙《福建通志》補刻本（圖版來源：《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導讀指引》，南天出版，2018 年，頁 48）

長卷上的〈臺灣與澎湖列島圖〉以北方在左、東方在上，形象與平面兼具的表現形式，呈現汪洋大海中的臺灣島與澎湖列島，此即由西向東航行時，或是以中國東南沿海為立足點，所望見的臺灣方位。圖上臺灣島的南北距離明顯地被縮短，澎湖列島及其散佈的範圍則被放大許多。臺灣島上開發較早、較為繁榮且位居交通中樞的府城、臺江內海及其外緣的沙汕列嶼，相對地被放大，充分顯現山水畫法地圖的獨特之處，可依製圖者個人的知覺（perception），將較重要的、眾所熟悉的，抑或欲凸顯的地區之比例尺放大，以呈現主觀的「心象地圖」（mental map）。鹿耳門港道位於全島中軸稍微偏右之處，是全圖的焦點。在鹿耳門港道與大港港道的周圍，以及臺江外緣的沙汕上，設有許多的砲台。至於地名的標示，除山川、河流、港口與境界線之外，臺灣縣以漢人聚落的「里」為主，鳳山縣民社、番社參半，諸羅縣除縣治外，其餘全為番社。較特別的是，在府城與洲仔尾之間，赫然出現明鄭時期的名勝古蹟－「洲仔尾花園」的註記。

〈臺灣與澎湖列島圖〉上，除少數音譯文字不同外，所有的地名與兩地之間的道里註記，與清初工部尚書杜臻（1633－1703）的《粵閩巡視紀略》中之〈附紀彭湖臺灣〉一文的記載，幾乎完全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府、臺灣縣的幅員註記，卻是與康熙《福建通志》補刻本或蔣毓英《臺灣府志》（1689）的記載相類似，亦即在同一幅地圖上，出現兩種不同系統的地理資訊，它們各自的道里計算方式也不相同。入清後的志書上，各地的道里皆以府城為起始點，計算府治至各地的距離，而杜文或署名沈光文的〈平臺灣序〉中之輿地記載，則純粹計算每兩地之間的距離。<sup>4</sup> 由於〈附紀彭湖臺

4 明鄭時期或清初的文獻上，南、北兩路各地道里計算的起始點皆不同，茲以力力社、麻豆社為例比較。蔣志：「力力社【離府治一百七十里】；「麻豆社【離府治四十五里】。〈附紀彭湖臺灣〉：「自下淡水十五里至力力社，又十五里至茄藤社」；「自新港社西南五十里至麻豆社」。〈平臺灣序〉：「…下淡水十五里力力社，十五里茄藤社」；「…自赤嵌城北行四十里新港社，五十里麻豆社」。〈臺灣與澎湖列島圖〉：「力力社：下淡水至力力社一十五里」，「茄藤社：力力社至茄藤社十五里」，「麻豆社：新港至此五十里」。蔣毓英纂修，黃

灣〉一文是「按圖」撰寫而成，<sup>5</sup> 文中各地的道里非以府治或縣治為起算點，且未述及一府三縣的行政區劃，又，1683 年年終至 1684 年夏季杜臻赴閩、粵視察時，臺灣甫入清版圖，<sup>6</sup> 由於輿圖的繪製並非一蹴可幾之事，依當時官員赴任前或到任時必參閱當地相關的記載與地圖，而且杜臻所見之地圖上又有洲仔尾花園的註記，<sup>7</sup> 故可合理推測，杜臻所參考的輿圖為 1684（康熙 23）年 5 月臺灣設置郡縣之前的明鄭時期臺灣古地圖，極可能是 1680 年洲仔尾花園興建後至 1683 年 9 月明鄭降清之間所繪製的。與杜文相似的〈平臺灣序〉中之輿地資訊，理當亦源自明鄭時期的古地圖。由此可知，〈臺灣與澎湖列島圖〉之所以採用新、舊兩種不同系統的道里計算方式，並以舊時的資料為大宗，極可能是受明鄭時期輿圖的影響，以類似杜臻所見的明鄭輿圖為藍本，註記各地之間的道里，之後再加註新設置的一府三縣的四至而成。此外，〈臺灣與澎湖列島圖〉與明鄭時期輿圖的關係，亦可由其製圖概念與〈臺灣府三縣圖〉、〈臺灣略圖〉（1664/5）（圖 3）有諸多相似處，以及「洲仔尾花園」及其周邊水系的呈現等，窺見一斑。

美娥點校，《臺灣府志》（1689），卷 1：〈封隅・坊里・社〉，臺灣史料集成，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 1 冊（臺北市：文建會，2004 年 11 月），頁 137–138。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 6，〈附紀彭湖臺灣〉，四庫全書珍本四集，438，景印文淵閣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年），頁 19–20。沈光文，〈平臺灣序〉，收錄於：范咸，《重修臺灣府志》（1747），卷 23：〈藝文四〉，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 4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 3 月），頁 1422–1437，頁 1429。

5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 6，〈附紀彭湖臺灣〉，頁 18。

6 1683 年 12 月 15 日（康熙 22 年 10 月 28 日）杜臻奉命赴閩、粵沿海一帶視察展界事宜，1683 年 12 月 29 日（康熙 22 年 11 月 12 日）由京城出發，歷時半年多，翌年夏天（1684，康熙 23 年）完成任務，隨後撰寫《粵閩巡視紀略》。見：《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 112，康熙 22 年 10 月乙丑（28 日）條（1683 年 12 月 15 日），頁 159；卷 113，康熙 22 年 11 月戊寅（11 日）條（1683 年 12 月 28 日），頁 164；卷 114，康熙 23 年 1 月丙戌（20 日）條（1684 年 3 月 5 日），頁 176，《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9 月）。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 1，〈提要〉，頁 1。

7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 6，〈附紀彭湖臺灣〉，頁 19。見本文第二章引文。

## 洲仔尾花園、大橋港—從古地圖及方志所作的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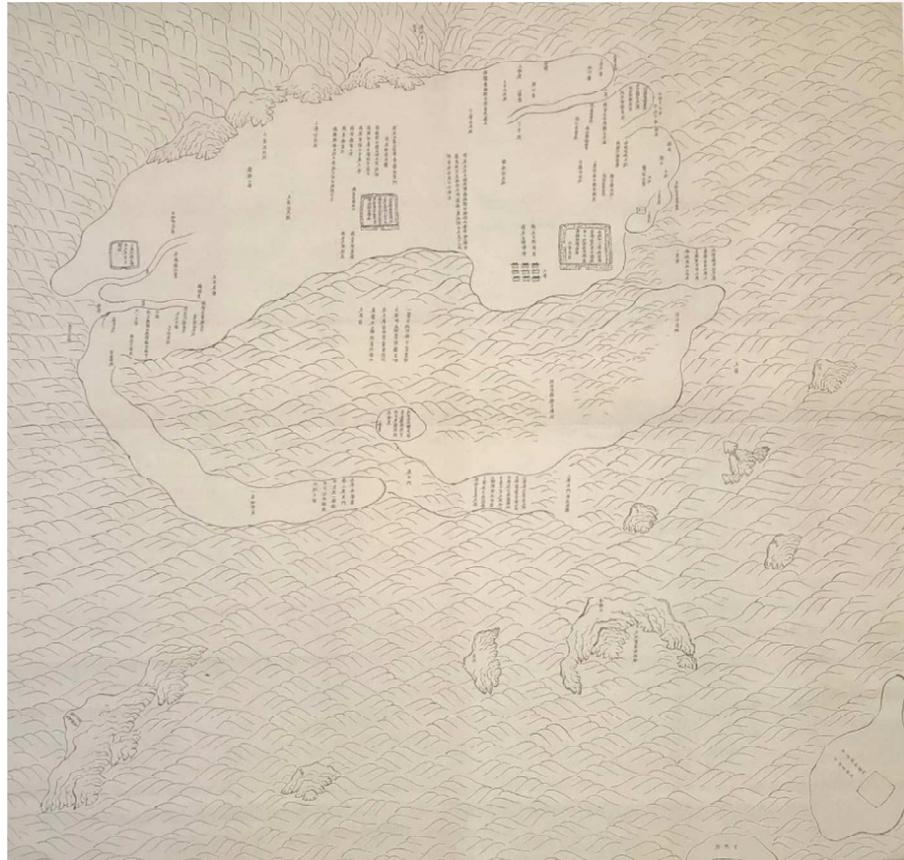


圖 3：臺灣略圖，1664/5 年，墨繪紙本貼簽，123 x 127 公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版來源：《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南天出版，2018 年，圖 II.1)

如前所述，「洲仔尾花園」—「承天府行臺」為鄭經所建。1674（永曆 28、康熙 13）年鄭經受邀支援「三藩」，跨海征戰，至 1680 年力難為繼，撤兵回臺，隨後由預立的監國，其長子克塽秉政，他自己則「退閒於洲仔尾，築遊觀之地：峻宇雕牆、茂林嘉卉，極島中之華麗；不理政務，嬉遊為樂」。<sup>8</sup>由臺灣府首任儒學教授林謙光（1687—1690 在職）於《臺灣紀略》（1690）中的這段記載，可一窺昔日「洲仔尾花園」建築的風采。江日昇於其《臺灣外記》（1704）中，對築園的動機與經過亦有記述：鄭經「以

8 林謙光，《臺灣紀略》，頁 54。

諸老宿如陳永華、柯平等相繼淪亡，不勝感嘆，遂于洲仔尾擇地，令李景監造園亭，種植花木」，「就洲仔尾園亭為居」，又「以其後事倚托有人，遂放縱於花酒，不預政事」。<sup>9</sup> 翌年初，鄭經病故於此。<sup>10</sup> 1683 年 9 月明鄭降清後，「洲仔尾花園」乏人看管，日漸荒蕪，後因「臺灣版圖新闢，…典章無闕，惟少一梵刹，福祐海天」，而「附郭大橋頭有廢舍一所」，亦即原「承天府行臺」，「宏敞幽寂，跨海面山，修竹茂林，朝煙暮靄」，很適合做為寺院，遂依臺灣鎮總兵王化行（殷化行，1687—1690 在職）之提議，將之改建為海會寺（開元寺），1690（康熙 29）年 9 月動工修葺，1691（康熙 30）年 5 月竣工。<sup>11</sup> 隸清後的志書可能未便記載「承天府行臺」，因而改稱之為「洲仔尾園亭」、「鄭氏北園」、「鄭氏別館」、「北園別館」、「鄭氏舊宅」等等。<sup>12</sup>

關於「洲仔尾花園」的地理環境與建築，巡臺御史黃叔璥於《臺海使槎錄》（1722）中曾記述道：「鄭氏北園，去郡治五、六里；從海視之，則直北矣，故名。園在平壤，無邱壑，亭臺曲折，凌峻之致」。<sup>13</sup> 根據黃叔璥的描述，此園座落在「平壤」，地形平坦，建築的氣勢因而顯得特別巍峨。由〈臺灣與澎湖列島圖〉（圖 4）觀之，「洲仔尾花園」位於被兩條交會的溪

9 江日昇，《台灣外記》（1704），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60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 年 10 月），頁 376—377。

10 永曆 35（1681）年正月 28 日，鄭經卒於承天府行臺。陳衍，《臺灣通紀》（1922），卷 2，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20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 年 8 月），頁 99。

11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1752），卷 6：〈祠宇志・寺宇〉，頁 537—540。（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刊本，作者點校）「洲仔尾園亭」改建為寺院之建議，由臺灣鎮總兵王化行提出，臺灣道王效宗（1687—1690 在職）讚允。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收錄於：張曼濤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八）—臺灣佛教篇》（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年 1 月），頁 269—320，頁 281—282。

12 「承天府行臺」應是原來的官式名稱，「洲仔尾園亭」可能是因地而名的俗稱。《海上見聞錄》、《海紀輯要》、《閩海紀略》等皆將「洲仔尾園亭」記為「承天府行臺」；黃叔璥以其位置在郡治之北，稱之為「北園」；劉府志稱之為「北園別館」。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頁 269—320，頁 280。

13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1722），卷 3 〈赤嵌筆談〉，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 47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 3 月），頁 51。（作者校正標點符號）

## 洲仔尾花園、大橋港—從古地圖及方志所作的考證

流四面環繞的一塊沙洲上，其下方另有一沙洲面臨臺江內海。環繞上下沙洲的水道相互連貫，形成梯子形狀，相當引人注目。〈臺灣與澎湖列島圖〉的河川形態及海岸線的形狀與〈臺灣府三縣圖〉（圖 5）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都同樣將「洲仔尾花園」周邊的水系，以及曾文溪水系以類似梯子的形狀呈現，殊為奇特。兩圖之間，抑或它們所參考的藍本之間，想必有某種程度的關聯。不過較之木刻墨印的〈臺灣府三縣圖〉，彩繪絹本的〈臺灣與澎湖列島圖〉將河川及海岸的造型與筆觸線條修飾得更柔和、工整，更具裝飾意味，顯示出一般摹本理想化其藍本的企圖。因此〈臺灣與澎湖列島圖〉的繪製年代應在臺灣設置郡邑之後，「洲仔尾花園」改建為海會寺之前，更確切而言，應在康熙《福建通志》補刻本問世之後，大約落在 1686 至 1689 年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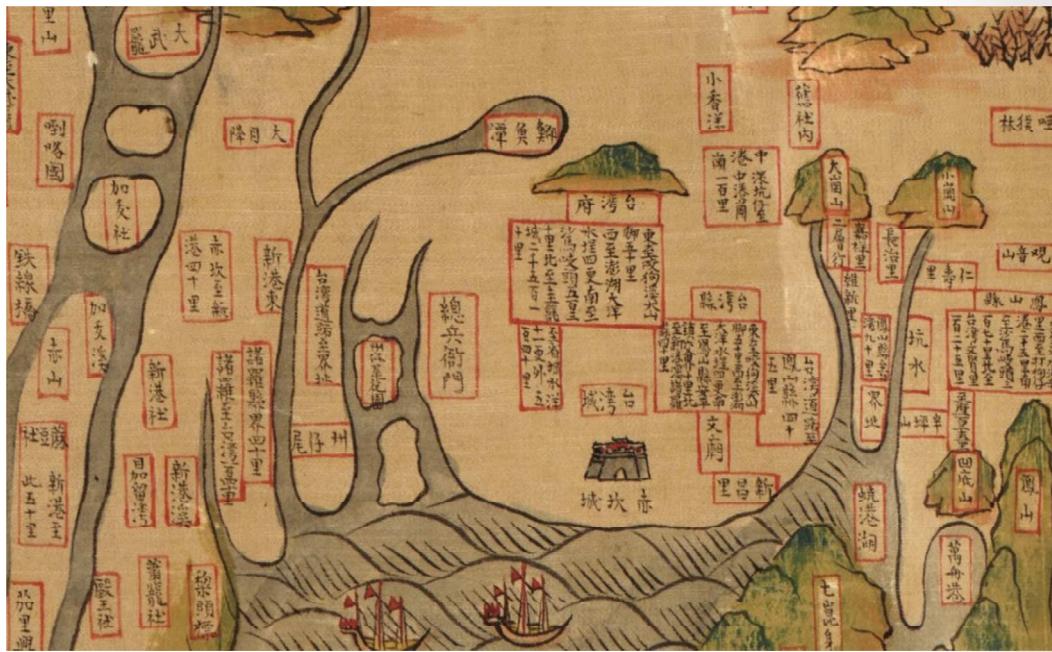


圖 4：臺灣與澎湖列島圖（局部）



圖 5：臺灣府三縣圖（局部）

〈臺灣與澎湖列島圖〉與〈臺灣府三縣圖〉的製圖概念的確大同小異，皆以大山為界，呈現北方在左的臺灣西部橫式地圖，藉山水畫法發揮「心象地圖」的特色，放大府城、鹿耳門水道與臺江內海周邊的比例尺。然而〈臺灣府三縣圖〉或〈臺灣與澎湖列島圖〉的製圖概念並非首創，明鄭時期的臺灣輿圖，例如出自於清內府，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滿、漢文箋注各一幅的〈臺灣略圖〉(1664/5、永曆 18/19、康熙 3/4 年，墨繪紙本，123 x 127 公分)(圖 6)(又名《臺灣軍備圖》或《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也呈現相同的製圖概念。<sup>14</sup> 較奇特的是，此圖將軍事重地連同政治中心：鹿耳門港道及其周圍的沙洲、「赤礮城」<sup>15</sup> 承天府一帶的陸地與海岸比例尺極度放

<sup>14</sup> 〈臺灣略圖〉，俗稱〈臺灣軍備圖〉。由於圖上的註記內容呈現永曆 18 年 7 月至 8 月之間，明鄭統治下的臺灣狀況，因此又名〈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鄭喜夫，〈「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之由來〉，《臺北文獻》，第 155 期（2006 年 3 月），頁 27–43。

15 早期的地圖與文獻對「赤崁」有多種不同的音譯寫法，如赤礮、赤墩、赤嵌、赤崁等等。為呈現史料的原始情境，當論及地圖及文獻內容時，本文保留其各自的寫法，餘則一律使用「赤崁」。

## 洲仔尾花園、大橋港—從古地圖及方志所作的考證

大，詳加描繪並註記，將天興、萬年兩州擠壓到臺灣島的兩端，可謂此典型的極端呈現。雖然同是以東面大山為界的臺灣西半部地圖，〈臺灣略圖〉與〈臺灣與澎湖列島圖〉以封閉的輪廓，呈現海洋中之臺灣島，強調其島嶼的地理特徵。同樣是放大府城與臺江內海的比例，〈臺灣府三縣圖〉則以傳統山水畫的處理方式，將「莫知其窮際」的中央山脈彼方留白，與天空融合為一，臺灣島的輪廓因而開放，由此發展出左右兩端可盡情延長的臺灣地圖橫卷，展現南北長而東西狹的臺灣西部地形特徵，〈康熙臺灣輿圖〉（圖 7）即屬之，因而與〈臺灣與澎湖列島圖〉的製圖概念不盡相同。儘管如此，〈臺灣府三縣圖〉與〈臺灣與澎湖列島圖〉雙雙承繼了明鄭時期臺灣輿圖的製圖概念，且保留了明鄭時期的政治象徵暨地標－「承天府行臺」／「洲仔尾花園」，乃是不爭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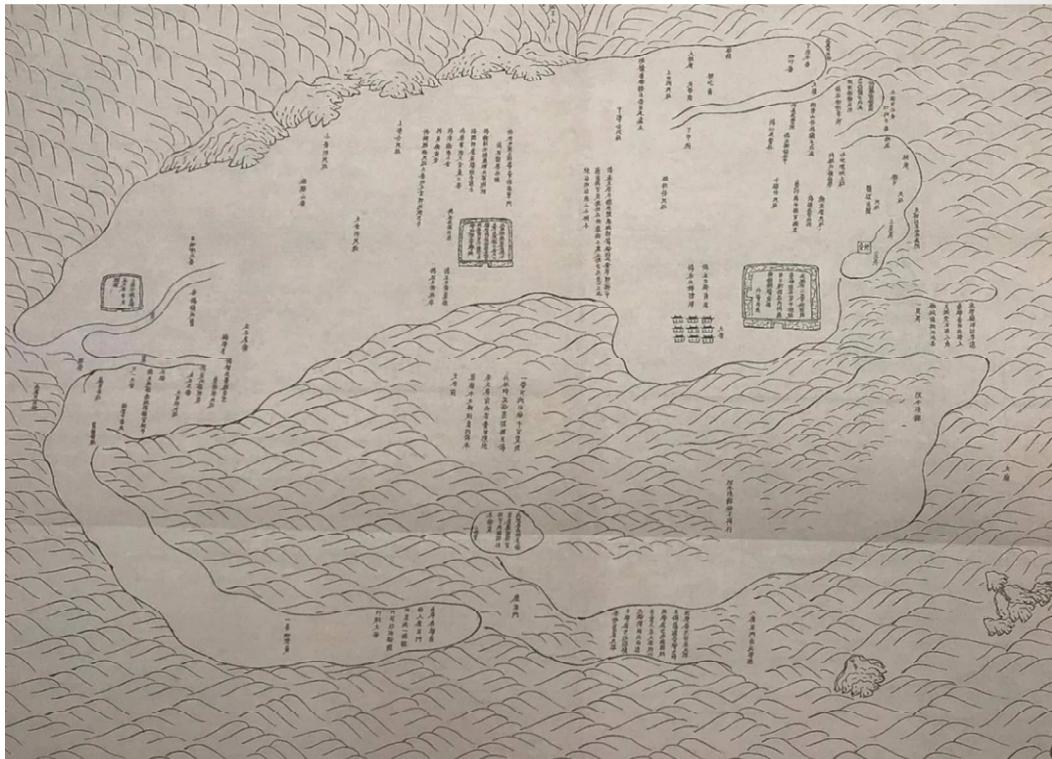


圖 6：臺灣略圖（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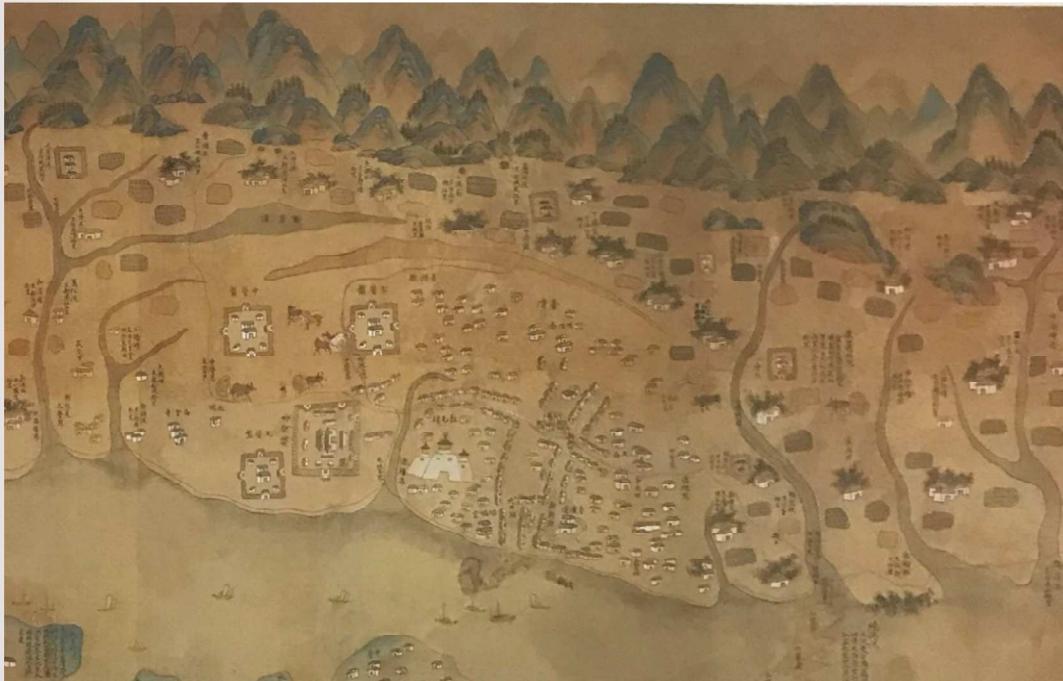


圖 7：康熙臺灣輿圖（摹本局部一），1699—1704 年，彩繪絹本，66 x 536 公分，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圖版來源：《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南天出版，2018 年，圖 III.3）

## 貳、大橋港、小橋港文字記載的矛盾與梳理

〈臺灣與澎湖列島圖〉以梯子狀的河川形態，襯托出「洲仔尾花園」的所在位置，確實容易吸引觀者的目光。或許是地理資訊不足，當時的河川描繪僅能以此示意的方式為之。然而這般樣式化的河川形狀，與臺灣方志中的記載，抑或與荷蘭人所測繪的地圖上之河川有何落差？「洲仔尾花園」周邊的河川網絡及其自然形態究竟如何？臺灣西部河川因坡度陡大、水流湍急、土壤沖蝕嚴重、乾雨季水量變化大，河川改道時而有之，此園周邊的水道是否也曾歷經變遷？為釐清這些問題，首須審視志書上的記載，確認歷史上各相關地點、河流的相對位置，梳理文字記載的矛盾與未盡之處。

介於赤崁與洲仔尾之間，究竟有哪些溪流是靠近「洲仔尾花園」且注入臺江內海。首先，由前述「附郭大橋頭」「廢舍」的提示可知，「洲仔尾花園」（海會寺）乃位於「大橋頭」附近。<sup>16</sup> 又，根據 1696（康熙 35）年高拱乾的《臺灣府志》記載，「舊為鄭氏別館」的海會寺位於「府治北六里許」，<sup>17</sup> 因此，所謂的「大橋頭」，理應指小北門外，「永康里北路往來路頭」的橋樑—「大橋」。<sup>18</sup> 與「大橋」名稱相關聯的溪流，按早期方志的記載，如蔣毓英《臺灣府志》（1689）〈敘川〉篇所述，應為「大橋港」及「小橋港」：「一曰大橋港、小橋港：合流東過武定里之南，分為二；又東過永康里，北為小橋港，南為大橋港」。<sup>19</sup> 這顯然是由下游逆流而上，沿溪觀看的一段敘述。此後高府志的〈山川〉篇亦沿用之，在其所附〈臺灣府總圖〉（圖 8）中，對大橋港、小橋港及其流向，也有簡明扼要的描繪。圖上赤崁城以北、洲仔尾以南注入臺江的溪流即為「大橋港」，其上游往東南東方綿延，而其北邊支流旁的聚落則被註記為「小橋」。比對上述圖、文後可知，「大橋港」與「小橋港」是主流與支流的關係，而「大橋港」顯然是早期此溪幹流的泛稱。因此〈臺灣與澎湖列島圖〉上，在「洲仔尾花園」會合的溪流，無疑地應為「大橋港」及「小橋港」，兩者同屬一水系。

16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1752），卷 6：〈祠宇志・寺宇〉，頁 538。

17 高拱乾，《臺灣府志》（1696），卷 9：〈外志・寺觀〉，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 1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 3 月），頁 729。

18 至 1752 年舊跡猶存的「大橋」與 1747 年已圮的南門外「大橋頭橋」，曾經一北一南，各位於「北路」與「南路」「的往來路頭」。范咸，《重修臺灣府志》（1747），卷 2：〈規制志・橋樑〉，頁 223。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1752），卷 3：〈建置志・橋渡〉，頁 350，參見本文註 21。

19 蔣毓英纂修，黃美娥點校，《臺灣府志》（1689），卷 3：〈敘川・臺灣縣水道〉，頁 151–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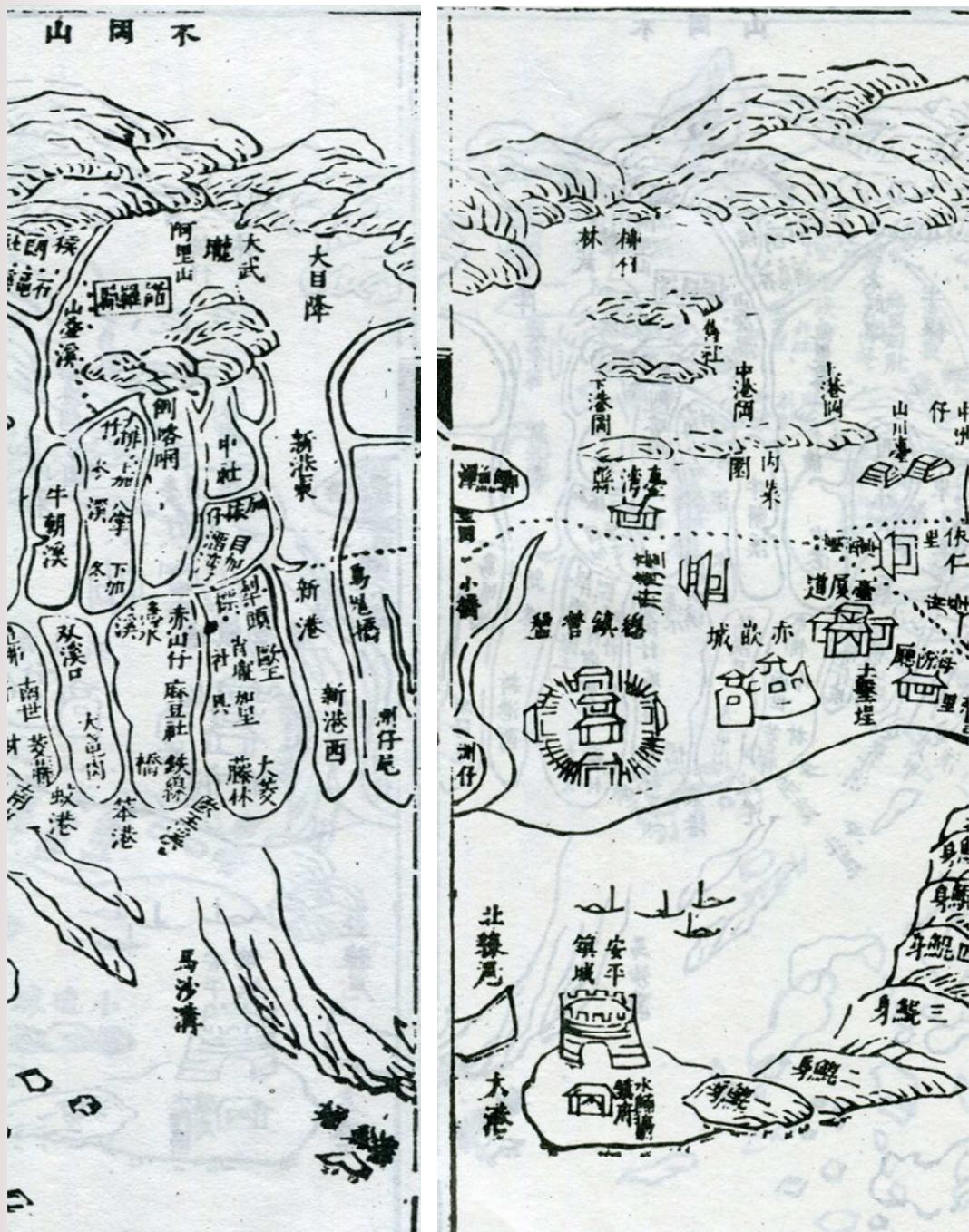


圖 8：臺灣府總圖（局部），1696 年，木刻墨印（圖版來源：《臺灣府志》景印清刊本，成文出版，1983 年，頁 121–122）。

「大橋」與「小橋」的名稱源自於 1644 年，新任荷蘭駐臺長官 François Caron 所「監督竣工」，由普羅閩西亞（Provintia）城鎮（赤崁）通往新港的一條新建大路所途經，兩條溪流上的兩座拱形磚橋。<sup>20</sup> 1752（乾隆 17）年刊刻的《重修臺灣縣志》亦證實，位於「北路往來路頭」，舊蹟尚存的「大橋」，乃「紅毛所造」。<sup>21</sup> 這兩座磚橋雖先後於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被洪水衝崩，<sup>22</sup> 但故址旁的聚落依舊以此為名，而「大橋港」、「小橋港」也順理成章地成為這兩條溪流的名稱。根據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中〈附紀彭湖臺灣〉一文的記載，「大橋」、「小橋」與「洲仔尾花園」都是明鄭時期承天府以北，主要交通道路必經之地：「澳之西岸有城曰赤墩，…城之北有花園」，「…自赤□城北行，歷大橋、小橋（二港皆經花園）、烏鬼橋（其港為下寮港），一百二十里至新港社…」。<sup>23</sup> 杜臻所記，明鄭時期由赤崁至新港社這一段道路，與 1644 年荷蘭人所修築的大路，<sup>24</sup> 以及十七世紀末的清代北路官道大致相同，皆途經大橋、小橋。清代在此道上設有大橋塘、小橋塘，派兵駐守。康熙末年官道西移，改經濱海的洲仔尾、鹽行。由此可知，「洲仔尾花園」自古即為北行陸路交通必經之地，且有舟楫之利，由安平鎮城乘船可達。鄭經選擇此地興築其行宮，除距離承天府僅五、六里之遙外，更是水、陸交通的要衝。

20 翁佳音，〈大橋的故事〉，《歷史月刊》，第 230 期（2007 年 3 月），頁 34–37，頁 35–36。

21 「大橋在小北門外，北路往來路頭，紅毛所造，蹟尚存」。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1752），卷 3：〈建置志·橋渡〉，頁 350。（成文出版社景印清刊本，作者點校，其他成文版臺灣方志引文皆然。）

22 1689 年《臺灣府志》記載：「大橋在臺灣縣永康里，洪水衝崩，今只存舊跡。」蔣毓英纂修，黃美娥點校，《臺灣府志》（1689），卷 6：〈市廬·橋·臺灣縣〉，頁 212。1720 年《臺灣縣志》記載：「小橋在永康里，洪水衝崩，舊址無存。」陳文達，《臺灣縣志》（1720），卷 2，〈建置志·橋樑〉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 8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 3 月），頁 321。

23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 6，〈附紀彭湖臺灣〉，頁 18–20。（景印文淵閣本，作者點校）

24 十七世紀荷蘭時代由赤崁到淡水所走的道路，事實上與明鄭時期的道路或同世紀末清代北路官道相去不遠，皆是沿著主要番社一路北上，「應該是臺灣番人在漫長歲月中走出來，蹊久自成徑」，所以這條道路的形成年代應更早。翁佳音，〈路是人走出來十七世紀中葉臺灣島內南北交通路線表〉，《歷史月刊》，第 232 期，（2007 年 5 月），頁 33–38，頁 38。

臺灣西部的河川「水皆西流」，而志書上的河川狀態記載，亦皆採由東邊開始，亦即從上游往下游的順序，逐一敘述，唯獨早期府志中的「大橋港」例外，採由西往東逆流而上地描述，且未提其發源地，或許是發源地不詳之故。（見附表）但 1720（康熙 59）年刊刻的《臺灣縣志》則將河川之描述一律統整為由上游往下游的順序，包括流經海會寺（洲仔尾花園）的水系，而有如下的記載：「又有坑曰石頭坑，無水源，受眾流小水，經海會寺前，過大橋，由柴頭港入于海」。<sup>25</sup> 方志所附之輿圖，具有補充文字敘述與加強說明的功能。「大橋港」與「小橋港」的名稱在這段文字敘述中雖然隱而未現，不過從《臺灣縣志》卷首的〈山川〉圖（圖 9）上，石頭坑的主、支流附近註記有大橋塘、小橋塘可知，此水系與「大橋港」、「小橋港」確實有所關連。更關鍵的是「經海會寺前，過大橋，由柴頭港入于海」這段描述，明確指出此溪「流經海會寺之前」不遠處，過了「大橋」之後，再經由柴頭港注入海裡。按荷蘭人建橋的記載，僅有一條溪流經「大橋」。<sup>26</sup> 以「大橋」為交集可得知，石頭坑（石頭溝）即為早期府志中所稱之「大橋港」，而《臺灣縣志》中的石頭坑，顯然取代了「大橋港」成為此溪後來的泛稱。

25 陳文達，《臺灣縣志》（1720），卷 1，〈輿地志・山川〉，頁 125–126。

26 翁佳音，〈大橋的故事〉，頁 35–36。

洲仔尾花園、大橋港—從古地圖及方志所作的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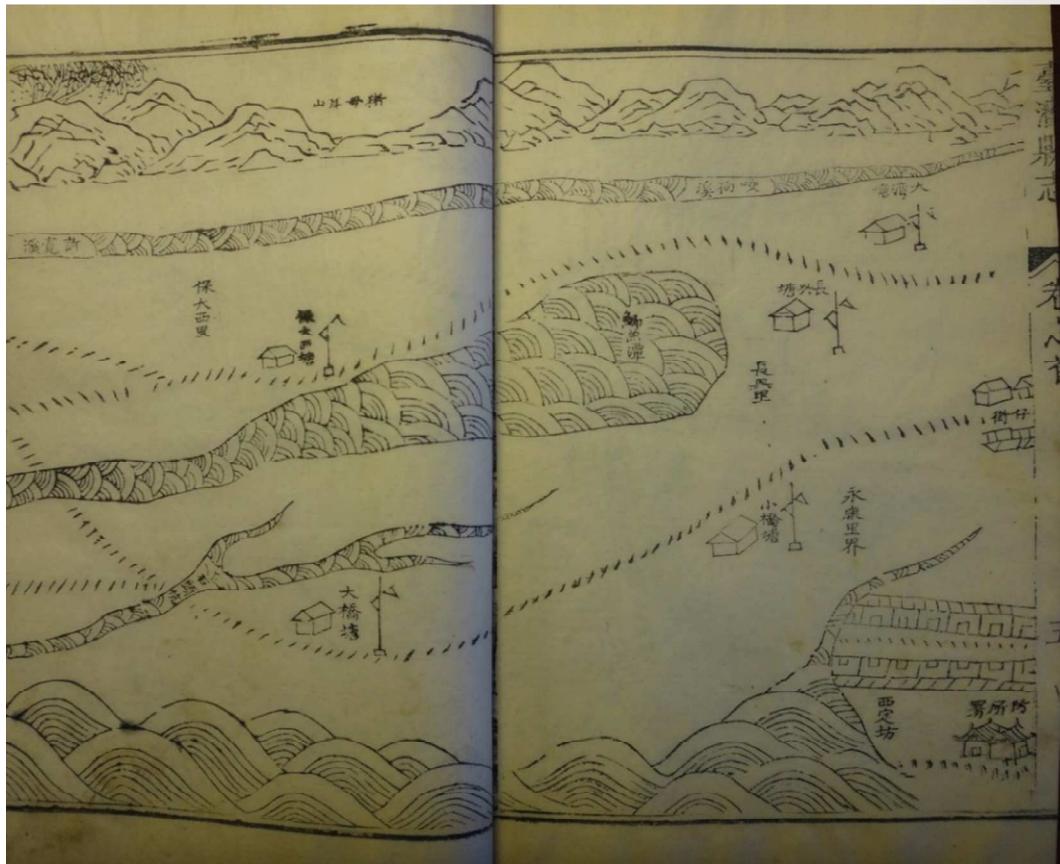


圖 9：山川圖（局部），1720 年，木刻墨印，《臺灣縣志》原刻本，頁 5–6，華盛頓 D.C.: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圖版來源：作者拍攝）

繼《臺灣縣志》之後，1742（乾隆 7）年刊刻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彙整舊府志所載的「大橋港」、「小橋港」水系與《臺灣縣志》所載的「石頭坑」水系，將之一併納入〈山川〉篇的記載中：「石頭坑：在郡治東北三里許，無水源，受眾流，經海會寺，過大橋，由柴頭港入海」、「大橋港：在郡治北三里許。小橋港：在大橋北，二港合流」。<sup>27</sup>此志書雖然增加方位與距離的資訊，並簡化對大、小橋港的描述，但將兩案併陳，重複

27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1742），卷 3，〈山川〉，頁 235。

記載了同一水系，容易造成「大橋港」為「石頭坑」以外另一河道的錯誤印象。更令人不解的是，將原先「經海會寺前過大橋」的「前」字刪除，致使「大橋」與海會寺的地理位置前後互換，河川流向顛倒。因為按字面，「經海會寺，過大橋」，意謂此溪先流經海會寺，之後再流經「大橋」。後續的《重修臺灣府志》(1747)、《續修臺灣府志》(1774) 亦沿用兩案併陳的方式，惟修訂了道里數（見附表）。<sup>28</sup> 如前所述，「大橋」的遺蹟至十八世紀中葉尚存在，<sup>29</sup> 府志的纂輯者們應不至於對此橋樑的所在位置毫無所悉，因此「前」字之被刪除，筆誤或疏漏陳陳相因的成分應該較大。至於兩案併陳、重複記載一事，可能是為彌補援用自《臺灣縣志》的文字中，大、小橋港名稱闕如的問題。

或許是意識到舊志書文字敘述的瑕疵，造成理解上的困擾，1752（乾隆 17）年刊刻的《重修臺灣縣志》，對此水系做更周詳的描述：「石頭溝在縣治東北三里許，無水源，受眾流之水，經海會寺前西下，由縣治北大橋港出柴頭港，西入臺江」。<sup>30</sup> 此版本除承接上述方位與距離的描述外，更保留《臺灣縣志》上的「前」字，且不再提已崩毀的「大橋」，而改描述此溪的流向，以及經由「大橋港」河道出海的事實，確實極為關鍵，非但補足《臺灣縣志》的缺憾，將「石頭溝」與「大橋港」連結在一起，廓清兩者實為一體的關係，且定義「大橋港」乃是自「海會寺前」西下後，這一段「石頭溝」的幹流。及至 1807（嘉慶 12）年的《續修臺灣縣志》，將文字稍做修飾後，更生動地描述此溪流在「海會寺前」的流向轉折：「石頭溝在邑治東北三里許，無水源，受東北眾坡之水，經海會寺前，轉邑治北大橋

28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1747)，卷 1，〈封域志・山川〉，頁 142。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1774)，卷 1，〈封域・山川〉，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 5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 年 3 月），頁 138。

29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1752)，同註 21。

30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1752)，卷 2：〈山水志・溪港潭陂〉，頁 224。

港，出柴頭港，西入臺江」。<sup>31</sup> 綜上所述可知，歷史上的「大橋港」所指涉的位置與範圍具有時代差異，十七世紀的「大橋港」乃泛指此水系的幹流，十八世紀中期以後的「大橋港」則被限縮，僅指自「海會寺前」，亦即「大橋」以降至出海口這一段。石頭坑、石頭溝乃此溪的俗稱，後來又改以港口稱此溪，而名之為「柴頭港溪」。十九世紀臺江浮覆後，柴頭港溪遂注入鹽水溪（舊稱新港溪）。

在「大橋港」與「石頭坑」、「石頭溝」、「柴頭港溪」為同一條溪流的梳理中，「大橋」的地理位置之確認至為關鍵。由「北路往來路頭」以及「海會寺前」「西下」的轉折點這兩項提示推知，「大橋」的舊址應落在北路官道與「石頭溝」的交會點上。雖然在《重修臺灣府志》(1747) 所附的〈臺灣縣圖〉(圖 10) 上，「石頭溝」的下游被註記為「大橋港」，顯示兩者合而為一的事實，然而自 1742 年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始，在府志、縣志的重修或續修版本所附的地圖上，「石頭溝」均為無支流的單一水道，而與文本上大、小橋二港合流的記載不相符。此外，圖上「大橋港」以北不遠處，另有一條單獨入海的小溪被註記為「小橋港」，但事實上此溪與前述有磚造拱橋且為「大橋港」支流的「小橋港」完全不相干。臺灣的地名俗稱重複，是常有之事，此為其一。地圖是對地形地貌記憶的映射，在 1696 年高府志的〈臺灣府總圖〉，以及 1720 年《臺灣縣志》卷首的〈山川〉圖上，早已披露了大、小橋港的形態，後世方志地圖的殊異描繪，或許與此小溪流域的沒落，抑或缺乏實地踏查有關。大、小橋港水系的自然形態以及「大橋」、「小橋」的地理位置，除由方志記載的推敲外，亦可藉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地圖，以及日治時期測繪的《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之相互比對，獲得進一步的確認。

31 謝金巒，《續修臺灣縣志》(1807)，卷 1，〈地志·山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 10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 年 3 月），頁 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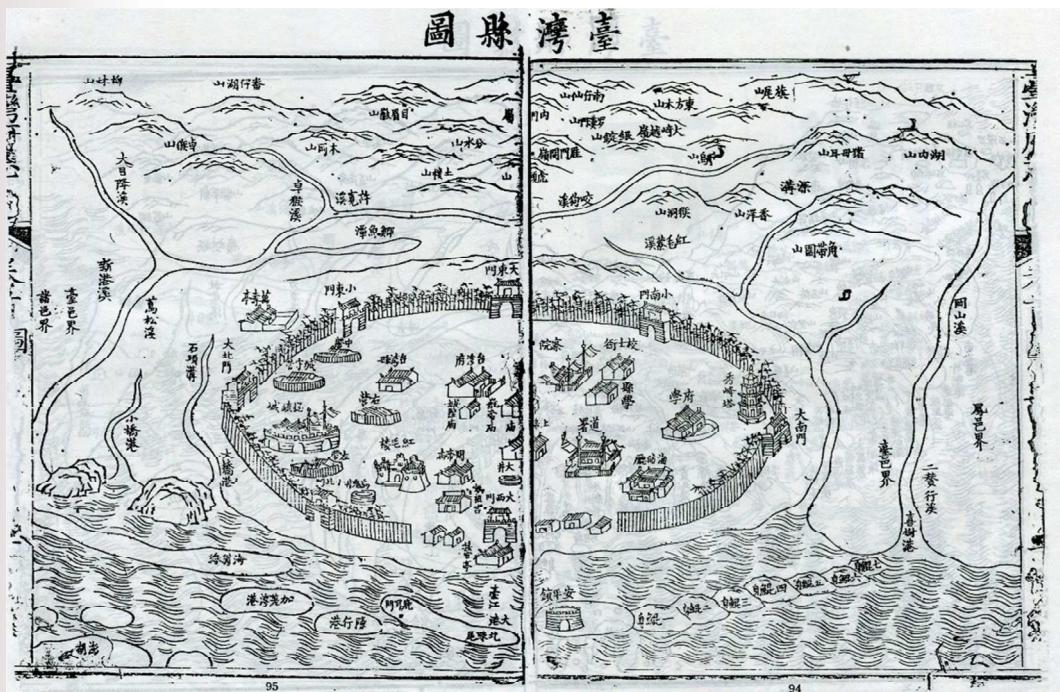


圖 10：臺灣縣圖，1747 年，木刻墨印（圖版來源：《重修臺灣府志》景印清刊本，成文出版，1983 年，頁 94-95）

## 叁、荷蘭時期與日治時期地圖的揭示

在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所繪製的地圖中，1644 年的〈赤崁耕地圖〉（*Map of the Cultivated Fields in Saccam*）（1644，40.5 x 55.5 公分，彩色紙本）（圖 11、12），很罕見地記錄了新修築的北行大路與兩條小溪相交的情況，首次提供「大橋」、「小橋」的地理位置以及「大橋港」「小橋港」河川形態的圖像訊息。此圖為該年秋天 Symon Jacobsz Domckens 在大員短暫停留期間所繪製，主要紀錄赤崁地區新修築道路與耕地的規劃情形。圖上將北方設定在左斜下方，羅盤盤面僅畫出輪廓，無比例尺的說明，也無地名的註記，圖面整體呈現未完成的狀態，不過道路和耕地的描繪相對較為仔細，且具些許景觀圖的樣貌：在尚未開墾的地方繪有梅花鹿，鯽魚潭中有水鴨，耕地旁有農舍，海上則有大小船隻。圖面上數條以黃色標示的

道路所形成的網絡，除具有交通、運輸的功能外，也作為基準線，藉此將耕地劃分為界線分明的地段（Polders）。<sup>32</sup> 這些道路中，有一條從赤崁海邊往東北東方延伸的筆直大路，在距離赤崁不遠處與兩條小溪相交，前文所提兩座磚造拱橋即興建於此二交叉點上，以供運送農作物的牛車通行。<sup>33</sup> 左邊那條小溪在農舍左上方不遠處注入右邊那條溪流。由相對位置和築橋的事蹟判斷，這兩條小溪即早期臺灣府志中所記載的「大橋港」及其支流「小橋港」。圖上「大橋港」的上游雖未完全被畫出，然藉溪流在交會點—「大橋」附近的顯著轉折，多少暗示了其源流的方位所在。〈赤崁耕地圖〉原本

附在從巴達維亞寄往荷蘭的信件裡，用以提供聯合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有關赤崁通往新港這條新建道路的資訊。

<sup>34</sup> 因此，儘管未完成，仍具高度參考價值。



圖 11：Symon Jacobsz Domckens, 赤崁耕地圖, 1644 年, 彩繪紙本, 40.5 x 55.5 公分, Den Haag: Netherlands National Archives, 4. VEL 1126  
(圖版來源: *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l. VII, Atlas Maior, 2021, p. 233)

32 格斯·冉福立 (Kees Zandvliet) 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下冊，論述篇（臺北：漢聲，1997年10月），頁73。

33 格斯·冉福立 (Kees Zandvliet)，《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下冊，頁71。

34 格斯·冉福立 (Kees Zandvliet)，《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下冊，頁71，見圖說與註 122。



圖 12：赤崁耕地圖（局部）

〈赤崁耕地圖〉的圖幅不大，但涵蓋範圍廣大，西自新港溪流域，東至三爺宮溪流域以及二層行溪下游，自是無法鉅細靡遺地描繪每一細節，僅紀錄當時拓殖的大致印象。或許是基於與北行新建道路交叉的關係，大、小橋港方有機會被較詳細地描繪，甚至在大橋港下游出海口附近的一個大曲流（meander）與江心洲，也被特別畫出。此後不久，1652 年左右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堪測員 Cornelis Jansz Plockhoij (1647–1654 在職) 所繪製的〈大員港道的完美海圖〉(A perfect chart of the Tayouan Channel) (85 x

96 公分，彩繪紙本）（圖 13、14），對大橋港下游也有精心的描繪：於普羅岷西亞市（M）北方不遠處的海邊，有一段蜿蜒曲折的溪流，靠近出海口最大曲流所圍繞的那塊地上，有建築物及一些樹木，據說是大員長官的莊園別墅，被註記為「綠谷」（Groendaal），相當引人注目。<sup>35</sup> 由地理位置判斷，此溪流應為大橋港（柴頭港溪），而這一段大曲流似乎與〈赤崁耕地圖〉上，大橋港下游出海口附近那個大曲流及江心洲有所關連。雖然〈赤崁耕地圖〉僅是簡略的示意圖，不若〈大員港道的完美海圖〉那般精確，但其製圖者對大員長官莊園別墅之所在，想必亦有所悉而特別關注。



圖 13: Cornelis Jansz Plockhuijsen, 大員港道的完美海圖, c.1652 年, 彩繪紙本, 85 x 96 公分, Den Haag: Netherlands National Archives, 4. VELH 141A (圖版來源: *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l. VII, Atlas Maior, 2021, p. 226)

35 格斯·冉福立 (Kees Zandvliet),《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 下冊, 頁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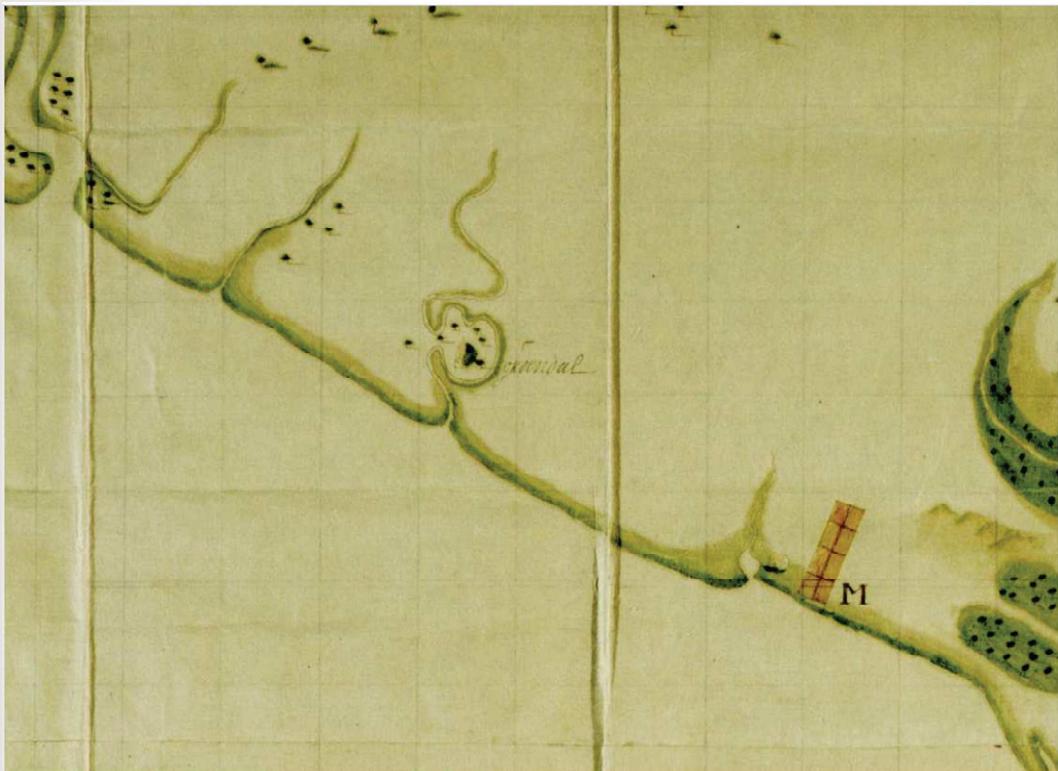


圖 14：大員港道的完美海圖（局部）

十七世紀中葉，大員港（大港）北邊的港道由於長年淤積，水深不足，船隻進出困難，因此多改經由南邊港道。Plockhoij 繪製此圖的目的，主要在顯示港道的淤積狀況，以「向在巴達維雅以及在荷蘭的專家請教水道學的問題」。<sup>36</sup> 除詳細描繪大員港道，以及港外大船停泊處之外，Plockhoij 亦為公司在大員及赤崁兩地的建設：熱蘭遮城、大員市鎮以及普羅閩西亞市鎮（Provintia）街道的擴展、1647 年大員市鎮南邊新開鑿的運河等等，留下重要的紀錄。此外，亦不忘探索臺江內海沿岸的河川，但僅限於下游河段與其入海口的描繪。雖然只是一小段，但藉 Plockhoij 之圖，吾人得以一窺大橋港（柴頭港溪）下游河道的曲折樣貌。由於河川的沖積，臺江內海快速地

36 格斯·冉福立 (Kees Zandvliet),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下冊，頁 61。

淤積，不斷形成新的堆積平原，蜿蜒於新平原上的河流因動能下降，經常產生曲流、合併或延長，使其形態多所改變。兩百多年之後，此處地貌變遷的軌跡依舊可尋。對照日治初期所測繪的《臺灣堡圖》(1898—1904)中之〈鹽行〉圖(1904，明治37年)(圖15)，以及日治後期《臺灣地形圖》(1921—1928)中之〈臺南北部〉圖(1926，大正15年)(圖16)，尤其是後者，在柴頭港溪下游相當於「綠谷」附近的河床上，依舊可見此溪流南北擺動所遺留的舊流路痕跡。不過中游「開元寺」(海會寺)附近，由於座落在古代「臺南沙丘」的範圍內，受後甲里斷層抬升的影響，沙丘東側有明顯的陡坡，地勢向西緩傾，<sup>37</sup> 溪水順流而下，深深切入沙丘，河道相對穩定，故未形成大曲流，亦未有大幅度河道擺動的跡象。一如在「洲仔尾花園」改建為「海會寺」後不久繪製的〈臺灣地里圖〉(c.1691—1704，109×280公分)(圖17)，抑或稍後的〈康熙臺灣輿圖〉(1699—1704)(圖18)上所呈現，「海會寺」座落於溪流右岸的平壤上，且未被水道所環繞，後者更描繪出此寺院的三進建築特徵。儘管〈鹽行〉圖及〈臺南北部〉圖上所測繪的「開元寺」，僅剩建物主體及其周邊的竹林、院落，其範圍較諸早期擁有廣大田園寺產時的「海會寺」，<sup>38</sup> 以及供鄭經與其文士武將於林園中圍場打獵的「洲仔尾花園」，<sup>39</sup> 規模顯然小很多，但幾經改建與擴建，其中最主要為1777年知府蔣元樞(1739—1781)(1775—1778在職)鳩工飭材修葺，成為三

37 張瑞津，石再添，陳翰霖，〈台灣西南部台南海岸平原地形變遷之研究〉，《師大地理研究報告》，第26期(1996年11月)，頁19—56，頁24,30。

38 按《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之記載，早期海會寺擁有寺產田五十甲(在寺後洲仔莊)、園六甲零(在寺前)，又樣園一所，供該寺香燈。蔣元樞重修海會寺，贖回寺僧所賣可稽之舊田產後，依〈海會寺園業記碑〉(1778)碑文所記，當時該寺的範圍東至大橋頭坑墘，西至藩殿莊、柴頭港坑墘，南至教場、中樓仔莊大路墘，北至馬房山李家園。對應今日的地點，大約是東到元寶里，西到正覺里柴頭港、南到九六新村、大道新村，北到永康六甲頂臺一線公路南邊。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1742)，卷18：〈古蹟·寺觀〉，頁1112。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1752)，卷6：〈祠宇志·寺宇〉，頁539。談宜芳，〈開元寺之建築〉，收錄於閻正宗等撰，《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級古蹟開元寺文物精華》(臺南市：臺南開元寺，2010年12月)，頁170—171。

39 江日昇，〈台灣外記〉(1704)，頁376。

開間四進、左右廂房對稱的建築群，其建築主體的座落地點與位置皆未改變，故可作為歷史地理探究之依據。<sup>40</sup>由〈鹽行〉及〈臺南北部〉圖與 Google Maps 臺南市區街道圖（2020）的套疊圖（圖 19、20）可見，日治時期「開元寺」的範圍，與今日永康區開元里該寺的大小已相去不遠。<sup>4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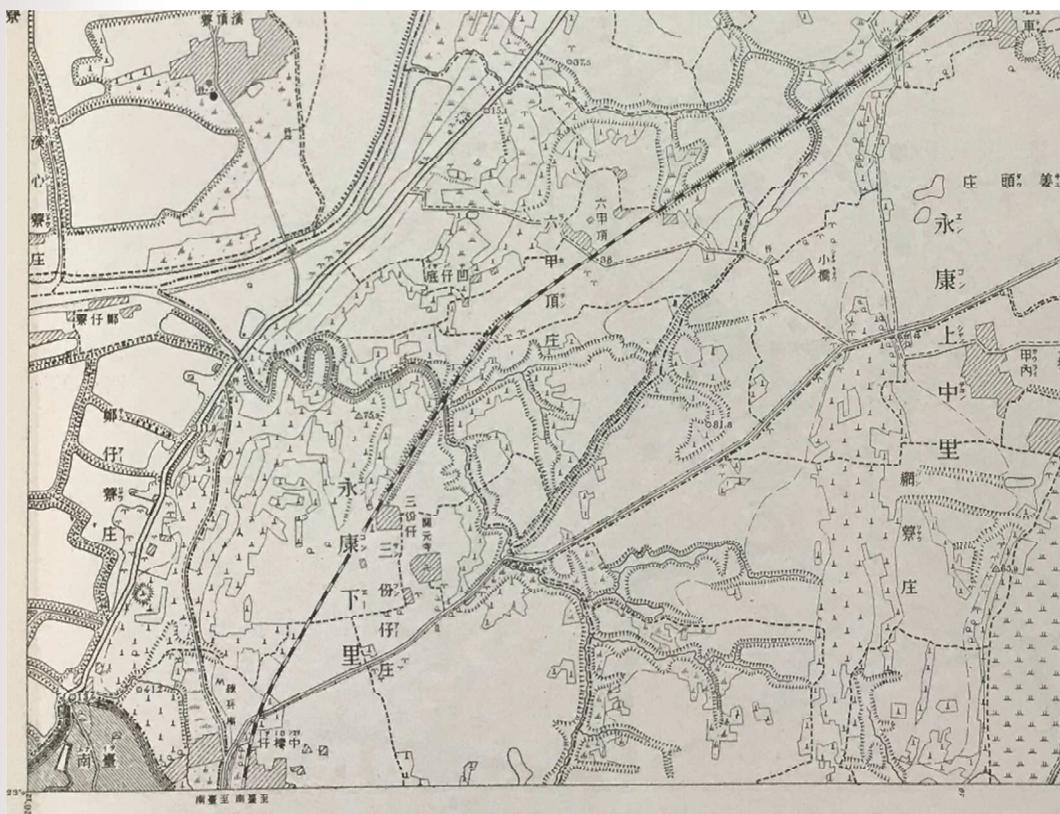


圖 15：鹽行圖（局部），1904 年（圖版來源：《臺灣堡圖》景印本，遠流出版，2007 年，頁 344）

40 蔣元樞原修，洪安全、林天人文字撰述，《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c. 1778)（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 年 12 月），頁 71—72。談宜芳，〈開元寺之建築〉，頁 177—180。

41 日治時期開元寺的範圍稍大，其西、南兩邊皆超出今日環繞該寺的北園街 87 巷之外。

## 洲仔尾花園、大橋港—從古地圖及方志所作的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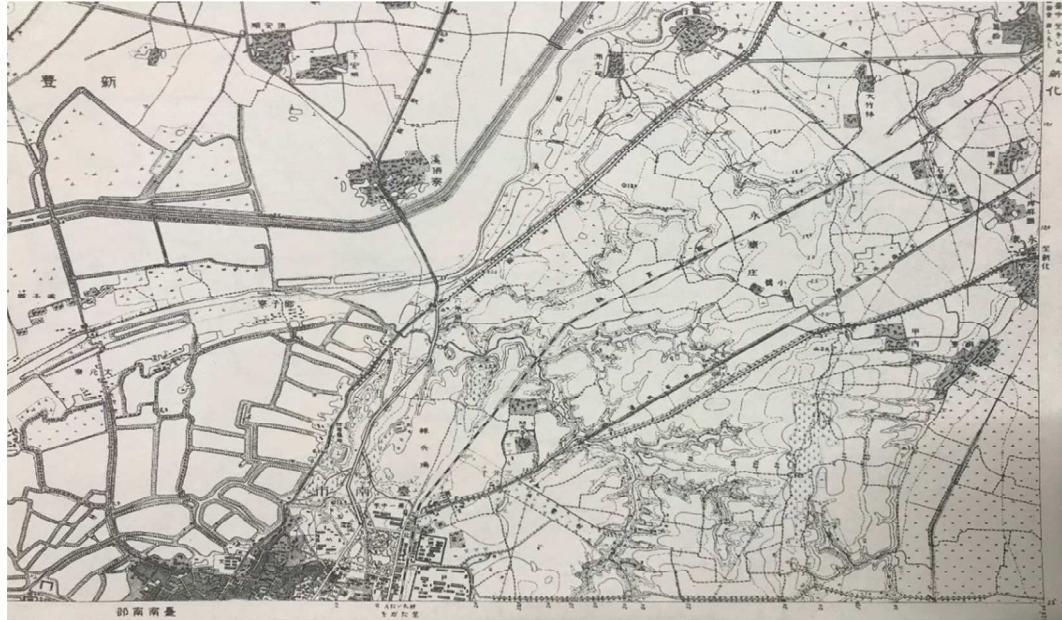


圖 16：臺南北部圖（局部），1926 年（圖版來源：《日治時代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景印本，遠流出版，2005 年，頁 125）



圖 17：臺灣地里圖（局部），c.1691–1704 年，彩繪絹本，109 × 280 公分，華盛頓 D.C.: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圖版來源：中央研究院數位方輿 Reading Digital Atlas 網站）



圖 18：康熙臺灣輿圖（摹本局部二）

由上述這些地圖的比對可知，自十七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初之間，大橋港中游的形態並無巨大的變化。而〈赤崁耕地圖〉所揭露「大橋港」水系形態的原初圖像，及其與荷蘭時期北行大路交叉的情形，更有助於釐清「大橋港」的幹流身份以及兩座橋樑的位置。就地貌、地物的相對位置而言，昔日的北行大路，應相當於〈鹽行〉圖上開元寺（海會寺/洲仔尾花園）東邊那條沿途架有電線的三等道路，它在〈臺南市北部〉圖上則被標示為植有路樹且架有電線的道路。昔日的「大橋」顯然座落在柴頭港溪（大橋港）與這條三等道路的相交處。透過〈鹽行〉圖與 Google Maps 臺南市區街道圖（2020）的套疊（圖 19）可見，大約在省道台 20 線與柴頭港溪

的相交處，亦即「開元橋」附近。而昔日「大橋庄」的故址，則在柴頭港溪東岸，今日永康區西橋里境內。<sup>42</sup> 至於「小橋」的位置，在〈鹽行〉與〈臺南北部〉二圖上皆有註記。由套疊地圖（圖 20）可見，「小橋」的舊址確實是在今日永康區東橋里「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內，與《永康鄉志》（1988）所載相同。<sup>43</sup> 值得注意的是，〈赤崁耕地圖〉上「大橋港」與荷蘭時期北行大路的相交處並無其他分流，亦即「大橋港」為唯一流經「大橋」的溪流，在〈鹽行〉與〈臺南北部〉圖上亦是如此。此二圖顯示，「柴頭港溪」（大橋港）上游匯聚眾坡之水後，於「大橋」轉西北繼續流，過了開元寺（海會寺）一段距離後，與支流小橋港合一，接著在附近又與縱貫線鐵路交叉，之後再蜿蜒曲折地注入鹽水溪（新港溪）。因此，「大橋港」與「小橋港」的會合處，並非如〈臺灣與澎湖列島圖〉所描繪之在「洲仔尾花園」（開元寺）的上端，而是在其下方一段距離之外。這些地圖的比對結果，可與上述臺灣方志記載的梳理相互印證。儘管「大橋港」被認定的長短範圍隨著時代而有些不同，但它確實是「柴頭港溪」（「石頭坑」、「石頭溝」）幹流的一段，而非如《永康鄉志》或《永康市志》所載之為「柴頭港溪」的「分流」之一。<sup>44</sup>

42 「大橋，故址在柴頭港東岸，離開元橋甚近。康熙以前，府城東、北向要道，均由今開元橋分叉。…及北行要道改經洲仔尾，莊民漸外移，乙未前後遭劫，廢庄…」。石萬壽主纂，《永康鄉志》，卷 1，〈建置志・聚落〉（臺南縣永康市：永康鄉公所，1988 年 7 月），頁 33。

43 「小橋，在小橋港邊，亦北行要道…，及北行改經洲仔尾，莊漸衰，降為小庄。日據初仍存，民國二十五年以軍事需要被徵收，…故址在今砲校之內」。石萬壽主纂，《永康鄉志》，卷 1，〈建置志・聚落〉，頁 33。

44 《永康縣志》（1988）或《永康市志》（2010）對「大橋港」與柴頭港溪關係的敘述，嚴格而論並未十分正確：「柴頭港溪，發源於臺南市東區後甲，北流過小東路，經永康鄉與臺南市北區交界線西北流，稱石頭坑，由柴頭港入鹽水溪。主要的分流及埤塘有大橋港（在大橋村，離開元橋不遠），小橋港（在大橋村，由今砲校內發源，西南流入支流）、萬裕碑（在五王村，今墳地為販厝，據傳原有大、中、前、後、東五埠」。石萬壽主纂，《永康鄉志》，卷 1，〈建置志・封域〉，頁 4。廖瑞銘總編纂，《永康市志》，上卷，〈地理篇・地形與水文〉（臺南縣：永康市公所，2010 年 11 月），頁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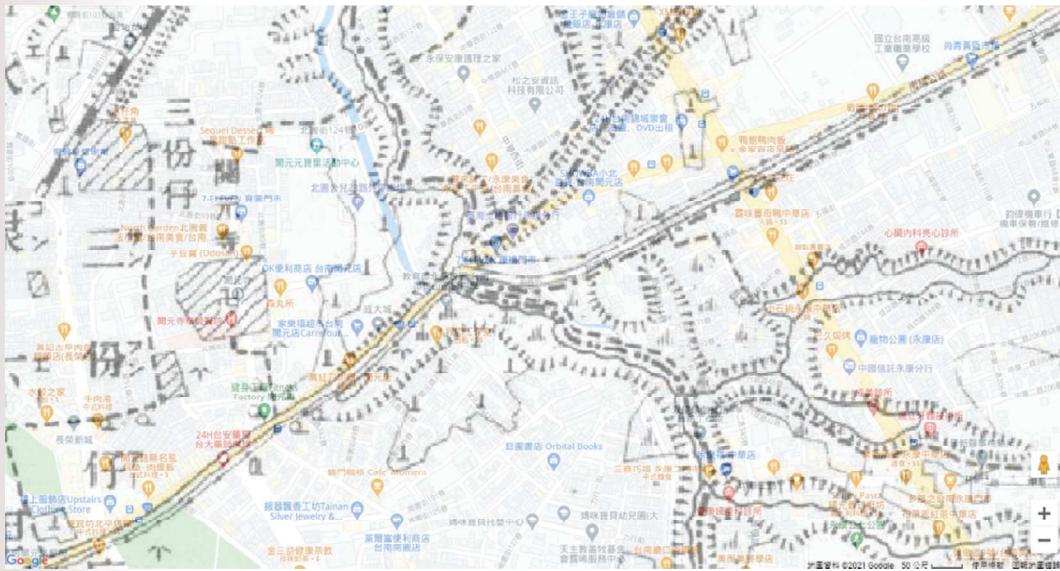


圖 19：鹽行圖（局部）與 Google Maps 臺南市區街道圖（2020）套疊（圖版來源：游牧笛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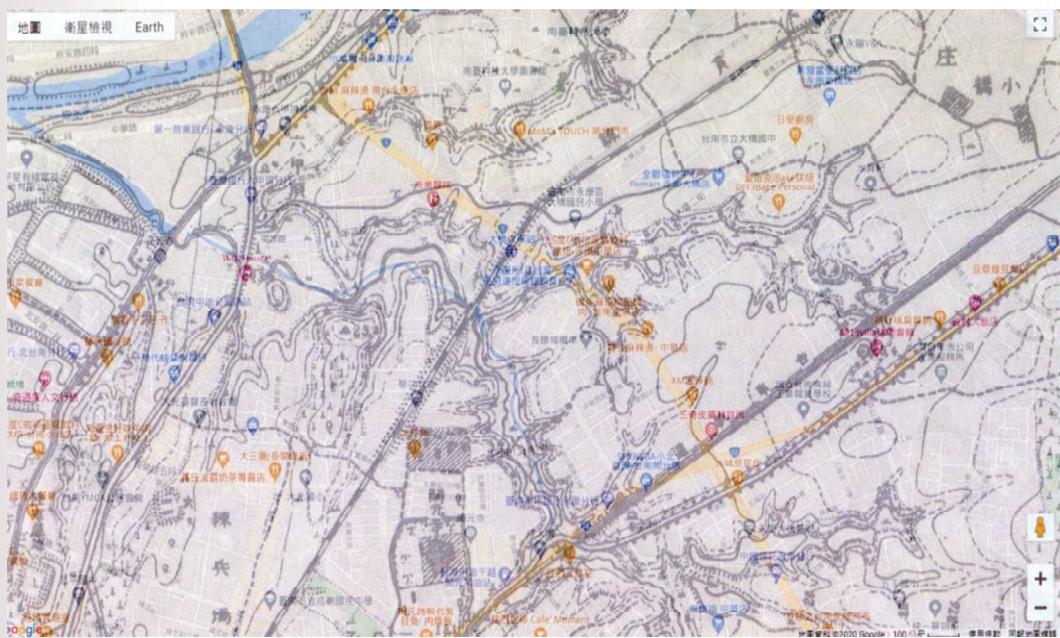


圖 20：臺南北部圖（局部）與 Google Maps 臺南市區街道圖（2020）套疊（圖版來源：游牧笛提供）

綜上所述，除康熙《福建通志》補刻本上的〈臺灣府三縣圖〉以及〈艾渾、羅剎、臺灣、內蒙古之圖〉長卷上的〈臺灣與澎湖列島圖〉之外，無論是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經實地測繪製作的地圖、康熙時期的橫幅長卷臺灣輿圖，抑或在高府志以降的方志附圖上，「海會寺」（洲仔尾花園）皆未被水道所環繞。檢視日治時期所測繪《臺灣堡圖》裡的〈鹽行〉圖與《臺灣地形圖》裡的〈臺南北部〉圖，亦未見「海會寺」附近的柴頭港溪曾經有過大曲流或離堆丘的遺跡。雖然無法得知，昔日「洲仔尾花園」的周圍是否有人工挖掘的壕溝，依現存的地理資訊觀之，並無天然生成的水道環繞之可能，何況大橋港（柴頭港溪）這等小溪中的沙洲，實際上也容納不下「承天府行臺」的亭臺樓閣與園林。那麼〈臺灣府三縣圖〉與〈臺灣與澎湖列島圖〉為何以如此獨特的梯子形狀呈現大、小橋港，又將「洲仔尾花園」圍繞在其中，其用意與蘊含的寓意頗耐人尋味。

相較於曾文溪或新港溪（鹽水溪），大橋港這條小溪與其支流小橋港的長與寬顯然被放大許多，其下游入海口處的寬度，甚至超過新港溪。由「心象地圖」的概念觀之，將大、小橋港變形，並特別放大「洲仔尾花園」周邊溪流的比例，無非是為營造護城河般環繞護衛的景象，凸顯其為明鄭行臺的獨特地位。當地圖圖像與地理現實之間產生歧異，通常是為彰顯「內在的景觀」（inscape），展現「現實世界以外的精神能量或形式」。<sup>45</sup>此一尊崇「洲仔尾花園」獨特地位的意圖與呈現手法，顯然是受明鄭末年輿圖的影響。此外，四面環水的孤島與封閉的境地，按西方烏托邦的概念，亦可象徵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sup>46</sup>洲仔尾花園之於鄭經，不也是遺世獨立的退閒遊觀之地。

45 Cordell D. K. Yee: "Chinese Cartography among the Arts: Objectivity, Subjectivity, Representation", pp. 164–165.

46 Bauer, Hermann, *Kunst und Utopie. Studien über das Kunst- und Staatsdenken in der Renaissanc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65), pp. 24–28.

## 肆、結語

中國古地圖中不乏以改變比例或形狀的方式，強調某些地圖現象，傳遞特殊意義的例子，亦即所謂的「心象地圖」。〈臺灣與澎湖列島圖〉上「承天府行臺」—「洲仔尾花園」的呈現方式乃為其中之一。圖上呈現梯子狀般連結的「大橋港」、「小橋港」水道，環繞「洲仔尾花園」，與此水系的實際形態、比例相去甚遠，其用意應為凸顯此一明鄭時期的重要地標。

「洲仔尾花園」存在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在明鄭末期的人文地理上確實佔有一席之地，清初的文人雅士如季麒光等多曾撰文記遊此園。此圖對「洲仔尾花園」的強調，以及兼有明鄭與清初兩種不同系統的地理註記等，在顯示其特殊的時代意義以及與明鄭輿圖傳統的關連。雖然傳世的明鄭輿圖資料極為有限，但由〈臺灣與澎湖列島圖〉的製圖概念與〈臺灣府三縣圖〉、〈臺灣略圖〉的諸多相似處，仍可歸納出一部分明鄭時期臺灣輿圖可能的樣貌。

歷代的臺灣府志、縣志及其重修、續修版本對「大橋港」的記載有些出入，如以不同的溪流名稱取代之，將新舊河川名稱一併載入，或關鍵文字的缺漏等等，造成敘述上的矛盾與理解上的困擾。本文重新檢視相關的地圖與文字記載，梳理文本的矛盾，分辨出不同時代對「大橋港」的認知差異。大、小橋港實際上是單純的主、支流關係，十七世紀的「大橋港」乃泛指此水系的幹流，十八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初的「大橋港」，則僅指自「大橋」始至出海口那一段。因此，「大橋港」實際上是「柴頭港溪」的幹流或幹流中的一段，而不是其「分流」。

附表：

年代	書名	河川	版本
1686	康熙福建通志 臺灣府 金鑑	大橋港、小橋港【合流東過武定里，南分為二，又東過永康里，北為小橋港，南為大橋港。】	文建會 2004年 頁40
1689	臺灣府志 蔣毓英	一曰大橋港、小橋港：合流東過武定里之南，分為二；又東過永康里，北為小橋港，南為大橋港。	文建會 2004年 頁151—152
1696	臺灣府志 高拱乾	一曰大橋港、小橋港：合流東過武定里之南，分為二；又東過永康里，北為小橋港，南為大橋港。	成文出版社 1983年 頁181
1712	增修臺灣府志 (重修臺灣府志) 周元文	一曰大橋港、小橋港：合流東過武定里之南，分為二；又東過永康里，北為小橋港、南為大橋港。	成文出版社 1983年 頁211
1720	臺灣縣志 陳文達	又有坑曰石頭坑，無水源，受眾流小水，經海會寺前，過大橋，由柴頭港入于海。	成文出版社 1983年 頁125—126
1742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劉良璧	石頭坑：在郡治東北三里許，無水源，受眾流，經海會寺，過大橋，由柴頭港入海。 大橋港：在郡治北三里許。小橋港：在大橋北，二港合流。	成文出版社 1983年 頁235
1747	重修臺灣府志 范咸	大橋港：在縣治北五里。小橋港：在縣治北一十里，與大橋港合流。 石頭溝：在縣治北三里許，俗名石頭坑，無水源，受眾流，經海會寺，過大橋，由柴頭港入海。	成文出版社 1983年 頁142
1752	重修臺灣縣志 王必昌	石頭溝在縣治東北三里許，無水源，受眾流之水，經海會寺前西下，由縣治北大橋港出柴頭港，西入臺江。	成文出版社 1983年 頁224

年代	書名	河川	版本
1774	續修臺灣府志 余文儀	大橋港：在縣治北五里。小橋港：在縣治北一十里，與大橋港合流。 石頭溝：在縣治北三里許，俗名石頭坑，無水源，受眾流，經海會寺，過大橋，由柴頭港入海。	成文出版社 1984年 頁138
1807	續修臺灣縣治 謝金巒	石頭溝在邑治東北三里許，無水源，受東北眾坡之水，經海會寺前，轉邑治北大橋港，出柴頭港，西入臺江。	成文出版社 1984年 頁177

(註：成文出版社景印清刊本，作者點校。)

## 參考書目

### 壹、史料

-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9月。
- 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原圖調製，《日治時代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1921—1928)。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5年9月。
-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1752)，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9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3月。
- 石萬壽主纂，《永康鄉志》。臺南縣永康市：永康鄉公所，1988年7月。
- 江日昇，《台灣外記》(1704)，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60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年10月。
-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5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年3月。
-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六，〈附紀彭湖臺灣〉，四庫全書珍本四集，438，景印文淵閣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
- 周元文，《增修臺灣府志》(重修臺灣府志)(1712)，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2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3月。
- 林謙光，《臺灣紀略》(附澎湖)。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澎湖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04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年5月，頁53—65。
- 金鉉主修，黃美娥點校，《康熙福建通志臺灣府》，(1686)，臺灣史料集成，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1冊。臺北市：文建會，2004年11月。
-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1747)，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4號。臺

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 3 月。

格斯·冉福立（Kees Zandvliet）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下冊，論述篇。台北：漢聲，1997 年 10 月。

高拱乾，《臺灣府志》(1696)，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 1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 3 月。

陳文達，《臺灣縣志》(1720)，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 8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 3 月。

陳衍，《臺灣通紀》(1922)，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20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 年 8 月。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1722)，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 47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 3 月。

廖瑞銘總編纂，《永康市志》，上卷。臺南縣：永康市公所，2010 年 11 月。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原圖調製，《臺灣堡圖》(1904)。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7 年 4 月。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1742)，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 3 號。  
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 3 月。

蔣元樞原修，洪安全、林天人文字撰述，《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c. 1778)。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 年 12 月。

蔣毓英纂修，黃美娥點校，《臺灣府志》(1689)，臺灣史料集成，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 1 冊。臺北市：文建會，2004 年 11 月。

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收錄於：張曼濤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八)——臺灣佛教篇》。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年 1 月，頁 269—320。

賴志彰、魏德文編著，《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導讀指引》。臺南市：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8 年 12 月。

謝金巒，《續修臺灣縣治》(1807)，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 10 號。

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 年 3 月。

闕正宗等撰，《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級古蹟開元寺文物精華》。臺南市：臺南開元寺，2010 年 12 月。

Bauer, Hermann, *Kunst und Utopie. Studien über das Kunst- und Staatsdenken in der Renaissanc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65.

Gommans, Jos; Diessen, Rob van, *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 Comprehensive Atlas of the Dutch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Vol. VII., *Oost-Azië, Birma tot Japan / East Asia, Burma to Japan & Supplement*, Voorburg: Atlas Maior, 2010.

Yee, Cordell D. K., “Chinese Cartography among the Arts: Objectivity, Subjectivity, Representation,” in: Harley, John Brian & Woodward, David (eds.) : *The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128—169.

## 貳、期刊論文

翁佳音，〈大橋的故事〉，《歷史月刊》，第 230 期（2007 年 3 月），頁 34—37。

翁佳音，〈路是人走出來 十七世紀中葉臺灣島內南北交通路線表〉，《歷史月刊》，第 232 期（2007 年 5 月），頁 33—38。

張瑞津，石再添，陳翰霖，〈台灣西南部台南海岸平原地形變遷之研究〉，《師大地理研究報告》，第 26 期（1996 年 11 月），頁 19—56。

鄭喜夫，〈「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之由來〉，《臺北文獻》，第 155 期（2006 年 3 月），頁 27—43

## 參、網站資料

中央研究院數位方輿 Digital Atlas，網址：

<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

## Zhouzaiwei Garden and Daqiao Port: Research based on Ancient Maps and Gazetteers

Tzeng, Shai-Shu \*

### Abstract

Zhouzaiwei Garden, which was built in Wuding Village as a temporary palace in 1680 by Zheng Jing (1642–1681), Prince of Yanping and son of Koxinga (1624–1662), served in that capacity for only a short period. *Taiwan and Pescadores* (1686–1689), one of the series of *Pictorial Maps of Aihun, Russia, Taiwan and Mongolia*, is one of very few maps that document this garden. Taking this map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unique representation of Zhouzaiwei Garden, which was surrounded by a stream known as Daqiao Port and its tributaries, as well as disparities with the actu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around it. The symbolic implications of this "mental map" will be discussed, as wi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rtographic concepts of *Taiwan and Pescadores* and the mapping traditions of the Kingdom of Tungning (Zheng dynasty), while issues relating to dating will also be analyzed.

There are some discrepancie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exts in different editions of gazetteers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that mention Daqiao Port, and these have caused confusions in understanding. Based on comparisons and analysis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examination of relevant maps, texts and the network of streams,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 and tributary streams of Daqiao Port and Xiaoqiao Port, distinguishes cognitive differences of Daqiao Port in different eras, and moreover confirms that Daqiao Port was a section of the main stream of Chaitougang River and definitely not its diversion.

**Keywords:** Zhouzaiwei Garden, Daqiao Port, Mental Map, Cartographic Concepts

---

\* Retired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